

元宵节猜灯谜

□何泰



习俗杂谈

春节期间，尤其是元宵佳节，中国民间素有观灯猜谜的习俗。猜灯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载，猜灯谜始于南宋。南宋时，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每逢元宵节，好事者都喜爱将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上供人猜乐。因谜语既能启迪智慧又饶有趣味，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元宵节猜灯谜，是件非常有趣的事。

灯谜有民间百姓创作的，也有文人潜心创设的。相传很久以前，有个财

主，人称“笑面虎”。他看见衣着体面的人，就拼命巴结；看见衣着破烂的穷人就吹胡子瞪眼睛。有个叫王虎的读书人，一次去他家借粮，因衣服穿得破烂，被“笑面虎”赶出了家门。王虎气不过，在元宵之夜，扎了一顶大花灯扛在肩上，特地停留在“笑面虎”的家门前，让路人竟猜大花灯的谜语。这大花灯上题写着一首诗谜：“头尖细如白银，上秤没有半毫分；眼睛长在屁股上，光认衣裳不认人。”“笑面虎”出门看罢，气得面红耳赤，暴跳如雷，嚷道：“好你个王虎，胆敢在大街上骂本爷！”说完，便命家丁去毁花灯！王虎挑起花灯，笑嘻嘻地说：“哎，我请老爷勿生气来勿猜疑，我这四句诗是个谜语，谜底是‘针’！你

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这是‘针’，怎么能说是您呢？莫非……这‘针’开口对您说话了，不然您怎么知道——我说的是您呢？”“笑面虎”气得干瞪眼，灰溜溜地关上了大门，周围看热闹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说起灯谜（写在彩灯上的谜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好玩”。

猜灯谜属春节、元宵节期间的娱乐活动。猜灯谜要上通天文时事，下通地理常识，有的还要涉及经史辞赋、俗事物件，几乎无所不包，有机敏反应能力和相当文化素养，真不容易猜中。灯谜（谜语）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即谜面、谜目和谜底，也称灯谜三要素。灯谜的猜法有拆字法（亦称“字形分析法”）、离合法、增补法、减损法、

半面法、方位法、参差法、移位法、残缺法、通假法、盈亏法、会意法、一字反义法、正字反侧法、题外暗扣法等。清末至民国年间，南通灯谜爱好者很多，不少人别出心裁精心制作了很多谜语，每年春节至元宵节期间，城隍庙、玄妙观、五公园等处常举办灯谜竞猜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南通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于1963年11月成立业余灯谜小组，后改称“灯谜协会”。灯谜协会于每年元宵节期间举办灯谜抢猜活动。“文革”时期谜坛一度沉寂。改革开放后，南通灯谜活动再度振兴，除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竞猜活动外，基层文化馆（站）、各企事业单位也常于节日举办“灯谜会”，引起广大群众的浓厚兴趣。



史海回眸

解放初期南通人民对传染病的防治

□程太和

解放前传染病肆虐，劳动人民遭殃

南通地方史料关于“瘟疫”“灾疫”的记载举不胜举。据如皋名医胡杰《痧疫论》所述，清道光年间，通州、如皋连续流行“痧疫”（霍乱、食物中毒、急性肠胃炎等），死亡无数。同治、光绪年间，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大的传染病流行。民国年间传染病的流行更是有增无减。当时的政府也曾组织一些防治工作，但大多无能无力，收获甚微。以致传染病蔓延，劳动人民遭殃。民国年间最为突出的是：1936年9月，原如皋县第四（双甸）、第五（岔河）、第六（马塘）、第八（掘港）四个区（现均属如东县）以及南通县的石港、姜灶等地，发生了一次病情危急，传染迅速，死亡率高的疫病，因为染病而死的人又快又多，民间说是“惹人瘟”，西医说是“恶性疟疾”，中医认为是“湿温时疫”。染上这种病的人症状是大热大寒，头剧痛，口大渴，有汗或无汗均不解热，欲饭不欲食，烦躁不安。进而神昏谵语，抽搐痉厥。至此，回春者极少。此病一人得之，传染一家；一家得之，大都可能传染附近各家，幸免者仅是少数。而农村染此病者比集镇多，蔓延不数日，危害几十个乡。其中，马塘区虹桥乡有一个村庄叫“百担圩子”，共有91户，271人，染病人数竟达243人，死亡110人。死亡之惨烈，不忍目睹。据当时的南通《政情月刊》刊载：此次疫情，“患者近十万，死者逾八千”。这次疫情为何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农村居住条件恶劣，房屋面积少，家庭人口多，家庭成员间容易传染；二是底层民众不注重个人卫生，加速了传染病的传播速度；三是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薄弱，医疗条件差，导致传染病迅速蔓延。民国年间除“恶性疟疾”外，“天花”“麻风”“白喉”“猩红热”“流脑”“肺痨”“疥疮”“伤寒”“痢疾”“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更是时时可闻，处处可见。

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传染病防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十分重视。上世纪50年代初，南通建立疫情报告制度。1951年，南通卫生系统发动医务人员对城乡居民普遍种牛痘，当年基本制止了天花流行。1952年起，在全市人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推动下，卫生防疫部门指导各级医疗机构的卫生防疫人员，有计划、有突击地结合各种中心工作，重点加强计划免疫和基础免疫的实施，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的蔓延。1953年南通共发生传染病2328例，其中：麻疹800例，痢疾822例，疟疾557例。50年代中期病魔绝迹。1955年贯彻执行卫生部颁发的《传染病管理办法》。1956年5月，贯彻执行《江苏省传染病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疫情报告制度逐步完善，饮食饮水卫生管理得到加强。全年处理病家107次，房屋消毒394间，计2.96万立方米。1956年天花绝迹。1957年，南通市区对390名清洁工人、600名饮食行业的职工、160名工厂、学校的炊事人员，分批进行卫生知识培训。对公私水井及缸水进行漂白粉溶液消毒，累计消毒总数115.5万次，消毒用水量312.5万担，使用漂白粉1251公斤，经抽样检查测定，有40%以上的饮用水达到要求。1958年，白喉、猩红热、伤寒、脊髓灰质炎、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6种传染病发病率控制在占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七以下。1960与1959年相比，伤寒下降44%，痢疾下降26%，百日咳下降23.63%，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下降57.7%，麻疹发病数只占1959年的0.64%，脊髓灰质炎、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病也大幅减少。1963年，重点开展肠道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市区共培训防治专业队伍266人。肠道传染病及其他各类传染病得到有效遏制。

大生纱厂工人创建抗日武装

□王茂华

抗战故事

大生纱厂于1895年创建于江苏南通唐家闸。从此，唐家闸这一新型工业城镇也以此开始起步。也就是说，唐家闸新型工业城镇的起步是以大生纱厂的创建为起点的，没有大生纱厂的创建和发展，也就没有唐家闸的新型工业城镇。因为，大生纱厂创建之后，因棉花、工价都比较低，运输也比较便捷，再加之经营方法得当，获利丰厚。后来，很快就可以大生纱厂为基础，发展企业，先后又创办了复兴面粉厂、资生铁冶厂、广生油厂等各类企业20多家。由于这些企业都以大生纱厂为依托，与之相配套，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集群，使唐家闸具有了较完整体系的工业区，进而又发展成了一个新型工业化的城镇。这一发展，不仅推动了唐家闸地区的工业化城镇的继续前行和社会进步，而且也影响了整个南通的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无论是大生纱厂的创建，还是唐家闸新型工业城镇的起步，这都标志着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实业救国的一个伟大创举。因为，大生纱厂的创建与甲午战争的失败有着密切的关系。事隔40多年之后，大生纱厂的工人创建抗日武装，又是在国难当头，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而采取的一种有效的对策。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1895年，中日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从而使中华民族危机空间加重，半殖民化大大加深。失败的事实告诉人们，落后就会挨打，就会遭到不平等的攻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批仁人志士吸取深刻教训，立志实业救国，奋发图强。大生纱厂的兴办，就是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时任两江总督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委派张謇回通州兴办实业的直接结果，也是后洋务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同

时，它更是爱国知识分子张謇在激烈的时代变化中，选择正确方向，把握历史机遇，弃官从商，以民族资本家的身份发展近代工业，使唐家闸成了张謇“实业救国”的实践空间。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张謇他作为一名五年前夺魁的状元，在“设厂自救”的浪潮中开始筹办，次年开始购地建厂，以招商股60万两创建了大生纱厂。因此说，大生纱厂的创建与“甲午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相关，它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的现实，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

在“甲午战争”后的第37年的1931年，日本侵略者又一次侵略中国，自这年9月18日侵占我国东北沈阳城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侵占了我国整个东北三省，先后长达6年的时间。继而又于1937年7月7日以全面侵华为目的，挑起卢沟桥事变，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不得不转入到全面抗战之中。这场战争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使中国人民自“甲午战争”后又一次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先后长达14年之久的侵略。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民族对日本侵略者实行全面抗战的时期，从1938年的11月开始，在这一创建与“甲午战争”有关的大生纱厂里，开始点燃了抗日的火种，进而发展创建了抗日武装，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就在1938年的11月，陈伟达找到梁灵光，说是南通城唐家闸大生纱厂的工人抗日热情很高，在酝酿成立抗日武装，他已物色了大生纱厂的职工宋祖望、王治平等人为发展抗日武装的骨干，但必须有一个正式番号，有了番号才能在地方上站住脚。对于大生纱厂，梁灵光早在上海读书时就知道，这是一个由著名的民族实业家、清末状元张謇先生于19世纪末创办的纺织工厂。此时，梁灵光他心里想，唐家闸是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如能迅速在日伪军控制的地区组建一支抗日武装，这对我们开展抗日斗争是很有利的。

说到这里，还应穿插说明一下梁灵光、陈伟达等人的有关情况。梁灵光于1916年11月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县鳌顶村一个亦儒亦商的家庭。1936年6月去马来西亚吉隆坡尊孔中学任教。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战。就这样，他和他哥哥的老朋友郑枢俊二人一道回国。郑枢俊是苏北涟水县人，郑枢俊对梁灵光说：“我们到苏北去，那里地主多，土匪也多。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地主豪绅都拥有私人武装，一个县有一万多支民枪，有利于我们开展抗日游击活动。”于是，梁灵光就和郑枢俊二人来到了江苏涟水县。后来，梁灵光经郑枢俊介绍认识了郑枢俊的朋友吴卫久。1938年6月，吴卫久和郑枢俊利用泗阳、涟水当地的人事关系，收编了一些农民和零星武装，成立了抗战支队，吴卫久任支队长，郑枢俊任副支队长、梁灵光任支队政治处主任。1938年8月，在抗战支队到达马塘之前，中共江苏省委就派唐守愚（唐绍宗）、陈伟达、吴佐成3人组成中共江北特区委员会，由唐任书记，到南通的通如海启一带开展工作，并从上海带来了一批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青年。开始，他们通过顾民元、马一行等人的关系，进入特务总队开展工作。在特务总队被缴械之后，梁灵光感到特务总队的这一批抗战青年如果失去了很可惜。于是，他就向抗战支队队长吴卫久提出收容这批人的建议，吴表示赞成，并要梁灵光具体办。就这样，梁灵光就委任顾民元为如皋县动委会秘书，又通过顾的关系将原在特务总队工作的一批政工人员，吸收到抗战支队政治处，这其中就有陈伟达、吴惠生等人。所以，陈伟达就是利用在抗战支队政治处工作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唐家闸大生纱厂工人的抗日活动，就是他通过深入了解，不断联系，开展宣传工作，从而得到继续推进的结果。

就这样，当时担任抗战支队政治处主任的梁灵光同志，就把他听到陈伟达讲的关于唐家闸大生纱厂的工人准备组建抗日武装的情况，及时找到抗战支队队长吴卫久商量。吴说，组建抗日武装可以，但抗战支队发不出饷，没有武器。此时，梁灵光

演戏，祈福消灾。项炽庭想起幼时所听“连篇辞语”，不仅包括更夫常常说的“火烛小心腊月天”“陈年月尽，火烛小心”，还有火神会谢幕告示观众的“年残岁底，火烛小心”等语，着实有趣。

项炽庭先生还写有两首关于腊月风俗的小诗，分别名为《送灶神》《谢神》，抄录如下：

民四官三送灶君，麦糖纸马豆刍陈。

上天好事求言说，贿赂歪风竟到神！

岁暮家家总谢神，鸡鱼猪首供三牲。

大香长锭庄严甚，鞭炮声声响满城。

灶神，如皋人俗称“灶老爷”，神号“东厨司令”。传说灶老爷进入腊月下旬，就要上天告状。于是如皋的官绅人家与庶民百姓分别在腊月廿三、廿四送灶神，即“民四官三送灶君”。麦糖是指麦芽糖，又甜又黏，盼望灶老爷吃后粘住牙齿，说话不便，即使开口说了，也要说“甜言”善语。豆刍

即豆草，指粮草。如皋人送灶神的供品，除去麦芽糖，还有夹生的赤豆饭、酒，希望灶老爷用劲咀嚼，以致无力话语；多喝多饮，以致酩酊大醉，难以话语。至于纸马和稻草等，则用以化火。在熊熊大火旁，人们祈祷灶老爷的保佑。

如皋人岁暮谢神，时间选在腊月十六夜至廿九夜。官绅人家富裕，供品会用猪头、公鸡、鲤鱼等。百姓人家只能供些馒头、豆腐、陈酒、清茶等。当然年根岁末，如皋人还要烧香拜神、点鞭放炮，驱赶年兽，乞求来年幸福！

项炽庭不是一味记述腊月风俗，而是有所思，有所得。他接受过新式教育，又历经清末民国乱世，尤其痛恨腐败贿赂的行为。

他在写完《九十忆旧诗》后，又补《示二首》两首，规劝后人要做清流。他又在《送灶神》诗末，直言不讳，批评送灶神实属贿赂神仙的行为，实不可取，令人深思。

项炽庭诗忆年俗思廉洁

□苇航 陈红

历史人物

品种繁多，送礼不易，需要多多思量，精挑细选，才能送出亲朋好友满意的礼品。“掸尘洁器”就是大扫除，寓意去除秽气。无论是家中，还是单位，年底都需打扫得干干净净。所谓“祥日”，一般选在腊月廿四夜，其实进入腊月中旬，便有人陆续开始大扫除。年底，家家户户还会拜祭祖宗，祭祀神仙。拜祖祭神，人人都要重视，所以“必敬庄”：内心敬重，外表庄重。于是百姓们穿上相应的衣服，置好相应的器具，才能祭祖祀神。

进入腊月，不比平日，大家说话，都要忌讳，开口须谨慎。“鹅鸣声”就是指那些不吉利的话语，如“死”“杀”等，少说为妙。孩子无知，虽说童言无忌，但是腊月黄天，也不能让他们信口开河，于是大人们往往用黄纸在孩子的嘴上擦一擦，以示禁言乱语。

冬末，火灾易发。旧时，如皋人进入腊月中旬，还会举办热闹的火神会，请人唱曲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